

# 论章乃器的战时经济思想

李晓翼,唐成努<sup>①</sup>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章乃器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系列解决当时财政金融困难的主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时经济思想:主张合理、平衡地运用金融膨胀;针对中国战时财政特质,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主张节制游资,平抑物价。

**关键词:**章乃器;战时经济;财政;膨胀;游资

章乃器不仅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而且是著名的银行家与经济学家,但由于人为的原因,人们很少研究、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一方面,政治上的声誉让他被视为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经济学术成就;另一方面,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使他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长期消失,而平反之时人已辞世。以至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笔者通过研读章乃器先生的经济学著作,发现章乃器抗战时期形成的战时经济思想很值得我们研究。全面抗战开始后,军费激增,开支浩繁,又加上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沦陷,关、盐、统三大税源大部丧失。在岁入日益减少而岁出则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便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之中;同时,通货膨胀严重,投机盛行,民心不稳。章乃器把民族生存与独立放在第一位,积极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整饬财政,积极为政府财政献计献策,提出一系列解决财政金融困难的主张,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战时经济思想。章乃器的战时经济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合理、平衡地运用膨胀

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颇为严重。在通货膨胀的初期,章乃器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持悲观的看法,认为这种膨胀足以致导致法币的崩溃。但加以研究后,章乃器发现,国统区战时经济有两个特点是过去任何交战国所没有的:一是1942年国统区各省因为风调雨顺,有人估计可以比1941年增加200亿元的价值,即使打个对折,也有100亿元,几乎等于法币发行额的一半。章乃器认为,工业化国家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增加等于货币发行额半数的物资生产,只有中国这样的靠天吃饭的农业国才有可能实现。二是中国的海外准备金由战前的不足2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0亿美元,增加了5倍,庞大的海外准备金可以保证汇价的稳定。基于以上两个原因,章乃器对国统区的物价保持乐观。他进而分

析,中国不可能出现恶性膨胀,因为中国不具备恶性膨胀的条件,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多兵的国家,中国的战时动员并不像别国一样需要增加好几倍的常备兵额。中国战时军事费的增加,主要用于兵员补充、军队调动、防御工事建筑以及武器弹药的消耗,增加的数目不会很大。特别在二期抗战以后,由于战略的改变,伤亡率大大减低,调动也较前减少,防御主要依恃天然地形,没有很多建筑与武器弹药的消耗,在游击战中,费用也节约很多,军事费除了为反攻作的准备外,一般比第一期抗战更节省。假定军事费比平时增加了两三倍,依然是很便宜的战争。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战时生产力的减退本来要比工业国轻些。以我国人口来推算,几百万人的动员更不算一回事。另外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天时的关系要占生产条件的首位,连年的丰收,反而使我们战后农作物的生产量比战前还有所增加。第三,中国的国民储蓄主要不在银行里,而在广大的民间,我们在战后发行的公债,还只有27亿元,和日本超过100亿日元的战时公债比较起来,真是几微得很。只要我们有好的政治动员,很平均的支配,27亿元公债的消化是不会成为问题的。章乃器分析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军需膨胀、公债发行和生产力三个方面,我们都没有具备恶性膨胀的危机。”<sup>[1]</sup>因而,当前的问题不是恶性膨胀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膨胀的问题。

章乃器认为,在金融上进一步的运用膨胀,以增加生产,巩固经济壁垒是更加切要、更基本的。我们绝不能害怕恶性膨胀,把自己的手脚束缚得动弹不得,转而削弱了持久抗战的力量。相反,我们应该运用合理的、平衡的膨胀,建立起来经济上自足自给、自力更生的基础,消灭恶性膨胀的危机。所谓合理的膨胀就是为生产而膨胀,只要能为生产而膨胀,一个钱的膨胀往往可以增加几千钱的生产力。生产力增加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08-05-20

**作者简介:**李晓翼,男,湖南茶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及教育管理;唐成努,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了,物价自然会向下跌落,恶性膨胀的危机自然就会消灭。这里讲的为生产而膨胀,就是把敌人后方的物力、人力动员过来,使敌人后方的生产有一个更大的资本膨胀。所谓平衡的膨胀就是把膨胀的力量转移到广大的敌人后方去,也就是把膨胀的区域扩大,区域扩大了,恶性膨胀的危机自然也就消灭了。只要能为生产而膨胀,同时把膨胀的区域扩充到敌人的后方去,以中国人口之多,物产之富,再增加一两倍的钞票发行额,也绝对不会成为恶性膨胀。他说:“在目前,为生产而膨胀和向敌人后方膨胀变成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只须发展敌人后方的经济,就已经是合理的膨胀,也就已经是平衡的膨胀。”<sup>[1]</sup>

## 二 把握财政特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章乃器对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好像是一所三层的建筑物:财政的来源依赖国民经济,而财政的运用依赖金融。所以,国民经济是基础,金融是中层建筑,而财政是上层建筑。”<sup>[2]</sup>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基本论断:“战争的要素是武力和财力。财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武力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土地、人口、资源和生产力,一面生长财力,另一面就生长武力。国民经济是武力和财力的源泉,所以国民经济决定了战争的性质。”<sup>[2]</sup>

章乃器比较了中国战时财政与资本主义战时财政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财政,就方法来说,尽管有募集内债、举借外债、停付旧债、创办新税、增加旧税、征用民间财物和提高国营事业收入等许多项目;就原则来说,则不外动员储蓄、控制膨胀、减低生活和运用外交四个范畴。由于资本主义战时财政的特点,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持久抗战的财政基础”。但是,中国的国民经济、金融和财政情况,与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第一,就国民经济来说,人力至少还有40%没有动员;农工的生产力,如能相当的应用科学,增加1/3以至一两倍都是可能的;地下的资源,更是90%以上都不曾开发。我国的国民每月收入,平均每人恐怕还不到30元,和先进的国家比较,增加10倍都一点不稀奇,增加半倍以至一倍应该是不难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就是税源的增加。这种税源的增加,是永远可以取用,而不受时间的限制。第二,就金融来说。贵金属大半都还散在民间;单就白银一项集中的还不及1/3。储蓄和存款都很不发达,连都市里的人,口袋里也装着许多不需要的钞票。这种力量倘使能展开广泛的民众运动把它集中起来,贵金属准备固然还可以增加两三倍,储蓄和存款的增加,也许更要多一些。第三、就财政来说,因为国家组织的松懈,行政效率很低落。只要能做到“铲除贪污,节约浪费”八个字,在平时,收入可以增加1倍,而人民负担还可减轻1/3,支出可以减少2/3,而工作仍能照常进行。战时即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只要能切实整理,收支的平衡是不难的。

根据上述分析,章乃器认为:“战时财政的基础应当建立在捐税政策和募债政策上面,而不能建立在货币政策上

面。”<sup>[3]514</sup>

他还指出,中国的战时财政不但要从上层贯彻到基层,而且要把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同时加以发展。就财政本身而言,固有的捐税,有些还可以增加税率而不至影响贫苦大众的生活;如中央的奢侈品税、地方的屠宰税之类。新的累进的直接税,如所得税、遗产税等,也可以积极推行。控制膨胀的战时过分利得税,更应该赶快施行。在金融方面,应该使银行事业深入民间,广泛的搜集贵金属,广泛的吸收储蓄和普通存款。在国民经济方面,设立一些工厂是不够的,还要广泛的扩展农业,动员小工业和手工业。只要我们能动员空闲的人力,开发荒废的资源,生产力的提高是无可限量的。应该科学地运用膨胀,使发行的增加不但不会抬高物价,而且可以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抑低物价。他说:“战时财政要贯彻到金融和国民经济,高度资本主义国家固然也如此,然而没有发展的。这种伟大的发展,一面奠定了建国的基础,而另一面就取得愈打愈强的持久抗战的财源。这就是我们的战时财政的特质。”<sup>[2]</sup>

## 三 节制游资,平抑物价

对于抗战期间大后方物价上涨危机,章乃器认为造成物价高涨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上海等地金融市场存在的巨额游资。章乃器对游资的破坏力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游资的囤积居奇是“目下高涨的唯一因素”。<sup>[4]490</sup>从商品方面看,是囤积;而从金融方面看,可说是游资的作祟。过去的通货膨胀虽然造成偌大的游资,目下游资的活动却已经足以逼迫通货的膨胀。在过去——特别是在限制支付之后,货币是处在主动的地位支配着游资,而现在游资是处在主动的地位支配着货币了。这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然而已经不是通货膨胀问题,更谈不上恶性膨胀(当前的货币问题与其说是膨胀问题,还无宁说是紧缩问题)。

章乃器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国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货币学上的新定律——货币购买力递减律。其表现是:货币发行额增加,货币购买力跌落。购买力跌落的速度要超过发行额增加的速度,而且是累进的。<sup>[5]499</sup>购买力之所以递减,实由于游资累进的增加,而未能加以节制。游资之所以累进的增加,则由于物价继续腾贵,货币利润大量的增加。那时政府即使充分运用捐税政策及募债政策,也不能消灭游资累增的趋势。这大量的游资,自然不会自动的按照各种商品存量的多寡,很平允的分配其购买力。恰恰相反,为着营种欲所驱使,游资会不约而同的向着战时需用最大而存量和产量均不足以应需求的商品市场奔驰。正和善于用兵的人一样,游资先生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之后,再去突破第二点,第三点,……使令整个的商品市场崩溃!这样,当着货币发行额以数学级数前进的时候,物价指数就可能以几何级数前进,货币购买力就自然递减了。他认为,只要能够规定游资活动的范围,限制游资的购买力,货币购买力递减律就不可能发生作用。而对付这庞大的游资,其办法一是要设法控制游资,二是要设法控制商品市场,最好是能够双管齐下。

关于控制游资问题,章乃器提出了四点建议:

1. 加强金融界人士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游资不是金融业自己的资金,然而金融业是可以左右的,金融界是应该负责的。因此,要控制这大量的游资,首先要在政治上加强金融界的向心力,彻底执行政府统一金融机构的意旨。<sup>[4] 491</sup>

2. 提倡储蓄和劝募公债。章乃器很乐观地指出:“倘使我们认为发国难财者都是没有民族良心的人,那也未免太机械。奸商的称呼往往是客观的,在主观上,他们大多数还和平常人一样。他们经营这种业务,而国家不曾严密的去管理他们的业务,他们就变成奸商了。只要有公平的方法,有完善的政治动员,赚了钱的人要他出点钱买公债,并不是很难的。”<sup>[4] 492</sup>

3. 实行战时通货的措施。采取限制法币使用数额等措施,冻结游资,稳定商品市场,防止贿赂贪污及其他非法收支,杜绝奢侈之风。

4. 举行国民财产总登记。登记的范围包括:土地陈报;商品;外国物币;证券;债权债务(小额可免)。

规定:未经登记的商品,卖出后,取得的货币,就是非法的。于是,他们就不能不登记了。同时还规定:支出货币收买未登记的商品,也是非法的。

章乃器以敏锐的目光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审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他的爱国思想、预见性思维以及现代化意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章乃器认为中国经济要想从根本上得到发展,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实现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洪流中,并为解决战时财经问题献计献策。这些充分地反映出其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在1949年9月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商业家的任务》的发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事业,积累资本,准备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消灭自己的阶级。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突出了其思想的革命性。

在不同的时期,章乃器总能立于时代前列,洞察社会,针砭时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经济思想的很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农村方面,他预见性地提出:“要通过工业化道路来发展农村生产力。我们不单是要求都市的工业化,而且要求农村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sup>[6]</sup>建国初期,就如何打击投机、私人钱庄的前途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前瞻性地指出:积极地与生产结合,最后融化在生产里。通过积极发展,将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私人钱庄就很容易地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

强烈的现代化意识是章乃器金融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章乃器是我国近代经济学家中完整提出创建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他把“完成一个现代的银钱市场”和“创造一个现代的资本市场”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目标。他提出的在中国推行股票和公司债券,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的主张,不仅阐明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揭示了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的方向,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把握证券市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和方向,构建和完善积极健康的证券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章乃器. 论恶性膨胀[N]. 大公报, 1939-09-24
- [2] 章乃器. 中国战时财政的特质[N]. 大公报, 1939-11-05
- [3] 章乃器. 由物资问题说到战时工业[M]//章立凡. 章乃器文集: 上卷.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 [4] 章乃器. 物价问题的症结[M]//章立凡. 章乃器文集: 上卷.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 [5] 章乃器. 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M]//章立凡. 章乃器文集: 上卷.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 [6] 章立凡. 章乃器文集: 上卷·学术编[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181.

(责任编辑: 徐 蓓)